

“史学月刊” 丛刊之一

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

嵇文甫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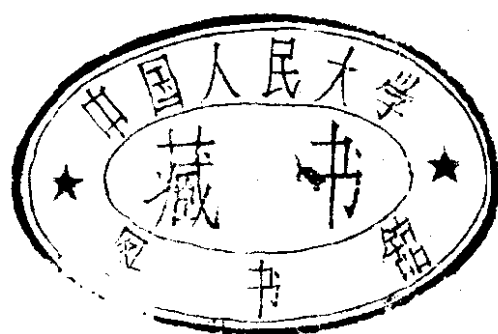
11(2)/6
378455

“史学月刊”叢刊之一

關於歷史評價及其他

嵇文甫著

RD44/11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1956年·鄭州

“歷学月刊”叢刊之一
關於歷史評價及其他

松文甫著

中國史学会河南分会編

※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※

豫總書号：554

787×1092 1/32 · 3 印張 · 60,000字

1957年2月第1版——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9,116册

統一書号：11105·2

定價：3 角

前 言

幾年來，作了些關於歷史問題的報告，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歷史評價問題的，去年已經根據這些報告中的材料寫成一本較有系統的小冊子出版了，本來沒有再把原報告彙集起來另行出版的必要。但是因為這些報告是針對着當時大家所提出的問題講的，較為直接而親切，和那本小冊子體例不同，可以互相參証，仍有它一定的用处，所以現在又把它編印出來。不過這些報告是在不同時間，不同地點，對不同聽眾作的，中間有些話不免重複，現在也沒法子刪改，只好原樣不動，聊備參考罷了。其中有些論點和“關於歷史評價問題”那本小冊子中所說的不很一致，當以後者為正。

嵇文甫

1956年11月15日

目 錄

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1951年2月18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上的講演)

關於歷史評價中的幾個矛盾問題·····	(1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1953年4月12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上的講演)

對一些歷史問題應該怎樣看法·····	(2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1953年8月29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上的講演)

關於歷史教學中的幾個重要問題·····	(41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歷史教育與愛國思想·····	(5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1951年5月13日在愛國主義與歷史教學座談會上的發言)

珍視祖國的思想遺產·····	(6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對河南師範學院畢業同學的演講)

怎樣對待文化遺產·····	(7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·····	(80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1954年12月19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舉行的報告會上)

對開封市大、中、小學歷史教師的報告)

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

(1951年2月18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上的講演)

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歷史大变革的時代，对过去歷史人物的重新估价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这也并不是一个多么簡單的事。有人这样講：現在時代变了，对于过去歷史要來个大翻案了，这事也很好办——凡是过去說他好的咱就說他坏，說他坏的咱就說他好，不就解决了嗎？这种無原則的翻案，是不能解決問題的。實則有些人，比如象秦檜、張邦昌之流，过去固然得不到好評，而現在依然还是得不到；又像苏武，过去說他好，現在就能說他是坏的吗？还有些人物，情形更比較複雜一點，并不是一翻就行的。漢武帝、唐太宗，本來过去就毀譽參半，有說好有說坏的，現在更不能采取無原則的翻案办法。

这个事兒——就使得我們感覺困难了！究竟有什么标准呢？对于某些歷史人物究竟應該拿个什么尺度來衡量他們呢？我对這個問題沒有系統而深刻的研究，今天姑且提出兩種偏向、三个标准、四个要點來談談：

兩種偏向

我們今天要防止兩種偏向：一种是“左”傾的偏向——这是歷史否定論。反正过去都是奴隸社会、封建社会嘛！我們現在是講的人民的歷史，而过去一貫所講的都是奴隸主的

歷史、封建主的歷史，歷史上記載的人物都是些——比如皇帝：歷代帝王都是專制君主！我們反對的就是這個！又如歷代官僚，都是為專制皇帝服務的！隨便舉出來些人物：漢武帝、唐太宗，都是皇帝，孔子、王船山、黃梨洲都是封建時代的思想家，都不能講！這樣一來，只用講講農民革命就夠了，除下這個，我們中國這五千年算是白過。這種態度，如果用到現實上，看見人就說你是地主，你是反動派，這樣便談不到統一戰綫，談不到有分別地、有步驟地處理革命工作了。另一方面，又有一種偏向——右傾的偏向：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把過去的人都寬容了原諒了。就人物來說吧：沒有純粹好的也沒有純粹壞的，岳飛也有壞處呀！秦檜也有好處呀！這樣善惡不分，是非不辨，歷史成了一場糊塗，根本談不上評價了。

這是兩種極端的看法。

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不能漫而言之，籠統一大包，都寬容，或籠統一大包都罵倒。對於現實人物必須有分別，對於歷史人物何嘗不然。王船山也知道這一點，在“讀通鑑論”和“宋論”里面衡論一個人的忠奸是非功罪都有一定的分寸和輕重。有明顯的善惡，象岳飛、秦檜灼然而不待辯；但同時也有複雜一點的，不明顯的善惡。同是善的，也有程度之分，同是惡的，也有輕重之別。比如蔡京、秦檜、史邇遠、賈似道雖然都是奸臣，但好的也有程度不同，這些地方船山都予以分別對待。

我們不是籠統一大包、整個地把歷史人物一齊痛罵一頓，一齊罵倒，但也不是一齊歌頌；我們去評價他們是有一定標準的，什麼標準呢？三個標準：

三个标准

第一，对于人民有贡献的，有利的；第二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；第三，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。合乎这三个条件都是好的，相反的，都是坏的。

过去虽然无非是封建社会、奴隶社会的历史，但有些人物确实对历史有所贡献。就当时的皇帝说，有些是为人民所深恶痛绝，而也有些为人民所纪念所歌颂。拿旧话来说吧，礼记上有“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他们讲究崇德报功：有创造发明为大家所采用的，献身于某种事业的，对国家有劳绩的，能御水灾旱灾的，能抵抗侵略的，都要被纪念被歌颂。如蒙恬造笔，蔡伦造纸，都可说是法施于民，直到现在我们还纪念他。这时如果你偏要咬住不放，说：

“蒙恬是为秦始皇打江山的”，那可糟了！秦国暴政他也有分儿！蒙恬造笔，固然秦始皇秦二世也用，但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。蔡伦是后汉一个宦官，我们知道东汉的宦官是最惹人讨厌的，但蔡伦造纸、法施于民，对于这点我们就恭维他，称颂他。又像“以死勤事”，有些制度，有些事情，固然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，但有些事情也很广泛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齐庄公被崔杼所弑，晏平仲站在崔杼门外说：“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，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若为己死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谁敢任之？”晏婴的态度就是这样：我是“社稷”臣，并不是你私人的家奴，假使你为社稷而牺牲，我可以陪你一齐牺牲，现在你自己作恶作够了，恶贯满盈被人杀了，你的“私人”也许可以为你殉死，但是我不干！过去好多“忠臣义士”自然有些是限定对其君主，但象苏武这些人，其意义就

甚廣大，既不限于君主个人，也不限于一家一姓。象这样的人不僅本朝崇拜他，歷代都崇拜他。

当然，他們所選擇的标准不一定合于我們的标准，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擴而大之來看。歷史上有許多軍事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就當時說，他何嘗不是为其君主服务？然而直到現在我們不还在談孫吳兵法嗎？直到今天，象孫子兵法不还是給我們种种啓發，成为軍事学的寶貴遺產嗎？我們打開左傳、三國等書，看歷代名將——李靖、岳飛……在軍事學上都有很多貢獻，他們的战略戰術成了整个人類的遺產。政治上象管仲、商鞅，他們有許多办法也还是我們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，到今天还值得我們學習和吸取。又象歷來的學者、藝術家——屈原、杜甫、吳道子……我們如果把這一些人都除掉，談文化恐怕是不好談的。戚繼光的“紀效新書”固然反動派可以用，但拿到人民手里照样有用。毛主席說得好：“我幼年沒有進过甚么馬列主義的學校，學的是‘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’一套，我識字便是从这里學來的。譬如‘學習’兩個字，就都有了，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。”這是中國人民的公共財產，所以我們歷史上有許多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科學家、文學家…只要對人民有貢獻的，我們都承認其功勞，都稱頌他。

其次，我們說到在一定歷史階段起進步作用，代表進步一方面的。秦始皇的暴政為人所唾罵，但在社會發展上，從商鞅到秦始皇是代表一個歷史的轉變階段，秦始皇完成了這個轉變，就這點來說他也自有其進步的一面。其他，象漢武帝、唐太宗對中國文化的擴大推廣方面也有其進步性；黃梨洲、王船山思想比較開明，而在他們的同時偏就有許多死守

住程、朱思想不放的反動分子；較之這些人來說，他們就是進步的，值得表揚的。

這第二點與前一點——第一點是有連貫性的。

再其次，表現我們民族的高貴品質的。——歷史上有些人也沒有具體的創作發明，而要說他代表進步方面吧，也說不上，就比如文天祥正氣歌里头所講的那一大批人物：“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，在秦張良椎，在漢蘇武節……”就是這類人物。蘇武牧羊流放十五年，你說對我們有啥具體的好處？但他就表現了中國人堅毅忠貞的高尚品質。按古代的三不朽說，有立言，有立功，也還有立德。這類人物就是立德。立德事實上對我們的民族也一樣有利。相反地，張邦昌、劉豫、石敬瑭，且不要說他對人民有害，專就其本人的品質上來說也丟中國的人。（笑）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向來是勤勞勇敢，堅決反抗異族壓迫；歷史上有這樣的人，我們當然要稱頌。象玄奘，除下他還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，在文化史上有很大功績以外，單單他那種精神——萬里長征，冒萬險，冲破一切困難，也使百世之下，聞風興起。

三個標準實際上是聯系的，就說成一個也行。這三個標準是很粗略的，但具體運用起來也很麻煩。因此我們下面又提出四個要點：

四個要點

第一，根據一定具體的歷史條件：我們說某人“于人民有利”，“有進步性”，必須放在具體歷史條件上來講，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看法。如果拿現在的標準去衡量古人，當然都不夠格。像後漢張仲景，是個大醫學家，在歷史上也算一個了不得的人物，他的“傷寒論”古人都認為是濟世活人

的書，但你偏要說“他那里面盡講些陰陽五行，烏煙瘴氣，一片荒唐之言！”這當然是跟他開玩笑。漢朝就流行陰陽五行，最高理論就是這個；你說：“那他咋不根據解剖學哩？”（大笑）請問當時那里去找解剖學呢？又如黃巢、李自成，你說：“他咋不接受無產階級領導哩？”“他咋不知道建黨呀？——象毛主席的建黨、建軍、統一戰綫那三大法寶他咋不知道運用呀？”（連笑）你叫他到那兒去找共產黨？——大工業生產、工人階級壯大才有可能產生共產黨；而即令這個時候作革命工作也必須有分別、有步驟呀！假使你在蔣介石統治時代去作工運，頭一天就提出：“奪取政權！”保險工人們都吓跑了，誰還跟着你干？從來工人運動的規律都是先由經濟鬥爭然後才慢慢達到政治鬥爭。我們現在不是討厭改良主義嗎？但要知道，反對改良主義並不是反對改良；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初也僅僅先着手改善工人生活。（但如果有一個政黨專把工人運動限制在眼面前的經濟鬥爭上，我們當然反對。）現代工人運動尚且如是，古代農民運動更不用說了。我過去在河南大學大禮堂看演戲——黃巢、李闖王；我就想：黃巢、李自成是失敗了，但假設成了功，他們能作到那一步呢？這就是這個問題：黃巢、李闖王向何處去？我想，最高成就也不過當個農民好皇帝——真的，他不當皇帝你叫他當啥？他組織個蘇維埃？（笑）歷史上農民的要求一般說也不過是“輕刑罰、薄稅歛”，（在我們革命初期也還不是先減租減息然後才進到分配土地？）假如黃巢、李自成不腐化享樂，直綫前進，無論怎樣前進，也不過發展到一個賢明的朝廷，解除一些農民的痛苦。在無產階級沒有出現以前，農民革命是沒有前途的，我們也不必因為他当了

皇帝就把他痛罵一頓，其實在當時能作个好皇帝也就算差不多了。比如明太祖，我們現在也還罵他“掠奪農民革命果實”，當然這是應該罵的！但這是就原則上講，也倒不一定單純地只因為當皇帝就罵他。後來明太祖離開農民，落伍了，變成地主了；但他在當皇帝以後，也作了一些解除元朝苛政，與民休息的事，這也還是農民的要求，對生產力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毛主席在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”那篇文章里曾談到歷代農民革命總使生產力向前推進一步——如果你承認這點，它還不是具體表現在輕徭薄賦那一套休養生息的政策上嗎？當然，象漢高帝、明太祖那樣的政權，還不是農民政權而是地主政權，不是革命而是改良；但他也多少緩和了階級矛盾，推進了生產力，使中國歷史還可以往前走；這便有他一定的功績。

第二，要認識歷史人物的多面性與複雜性。這一點往往使我們教書的感到頭痛：對於一個人到底是好哇是壞呀，往往搞不清。漢高帝從掠奪農民革命果實來說，壞。但解除了農民一部分痛苦，好。秦始皇狂暴的很，專制魔王。你要講專制魔王只管找他當代表好了。但張居正說他“混沌之再辟者也”，李卓吾說他“千古一帝”，這咋下評語呢？很簡單——他是什么你就還他个什么，——我們作民主鑑定，不是也有“優點缺點”嗎？（笑）他本身是複雜的，多方面的，你何必要把他簡單化呢？具體一點不好嗎？最忌諱“好就光好，壞就光壞”——這倒不合乎歷史事實了。

根據以上兩條倒可以防止左傾偏向，很“客觀”很“公平”，放到歷史上不會“一齊罵倒”，“一筆抹殺”。但照這樣講，每個人都是有好有壞，好中有壞，壞中有好。——

这个人怎么样？有好有坏。那一位如何？有坏有好，（笑）这还講什么歷史呢？

因此，还得注意下面兩點：

第三，站穩階級立場，反对客觀主义。对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以勞動人民的利益为依据。尤其凡關於階級斗争的事實我們更不能敌我不分。比如黃巢、李自成，这是歷史上的重要關鍵，尖銳的階級斗争。你不能說这是什么“起反”、“平乱”。皇甫嵩平黃巾在舊歷史上都記到功劳簿上了，但照我們說，那是屠殺人民。曾國藩，很有些人象蔣介石一流都很恭維他，蔣介石走的就是曾國藩的路，过去簡直把他捧到天上了。章太炎当他在清末正革命的時候，对曾國藩估計就已經不那样了。其实章太炎跟着孫中山革命还算不上三民主义，至多只能算是“二民主义”；（笑）但他对曾國藩的認識就比較前進了一步：他罵他是民族罪人。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曾國藩有功劳，而章太炎就以为：他有什么功劳！至多也不过象皇甫嵩、朱儁一流人，連漢唐名臣、中兴名將象郭子儀、李光弼都比不上。——章太炎的評價已經把曾國藩的身价降低不少，當時倒覺得这种說法很新穎，其实今天我們看來还是不够，除了民族罪人以外，他还是个屠殺農民的劊子手；双料罪狀，半點功也沒有！這一點章太炎看不到，因为他不懂農民革命。章太炎的看法和前人的看法不同，我們的看法又和章太炎的不同，这就是个立場問題。章太炎主張共和，主張民主革命，所以在辛亥革命時代，他还跟得上，到了“五卅”、大革命時代——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义范疇時，農民起來要求土地，他就不懂了，不行了。这因为他站的是地主立場，他的認識和他的生活實踐是完全一致的。

至于同是一个反動階級，同是一些統治者，剛才我們曾說要有程度、有分別地对待，然而这也还有其一定限度。

现在有“開明”地主有惡霸地主，过去也有“惡霸君主”：像隋煬帝、刘子業、蕭宝卷……都是君主中間的惡霸，窮兇極惡，不成問題應該毫不留情地鞭笞他；但即連“開明”帝王——開明尽管開明，畢竟还是帝王。這一點絕不能含糊，絕不能漫無限制像舊史家一样歌頌“天王聖明”。黃梨洲、王船山、这是開明学者，我們承認。但我們是不是一味恭維呢？不能。有几位新史学家把顏習齋說成代表農民，因为他出身寒苦，講究实用……哪能这样講？其实他还不如王船山、黃梨洲，他竟然主張恢復宮刑！按照他的主張他还要恢復“封建”，恢復井田——既恢復“封建制度”，就有帝王，有諸侯，既有帝王諸侯就必須有宦官；而宦官，与其把好人閹割了倒不如恢復宮刑，施之于罪人，一举兩得！这簡直是奇想天開！如果不看他的書，就会籠統一大包断定他代表農民。

我对王船山固然很恭維，但有些学者甚至說他的学說是“市民哲学”，也未免太过。王船山“俟解”上有論陈白沙和莊定山的一段話。——陈白沙是个翰林，莊定山是个“主事”，有一次兩個人一同渡河，同船的一些“惡少”知道他們二位是道學先生，便故意說些淫嫖猥褻的話；莊定山沉不住气了，

“怒形于色”，但是回头一看陈白沙，果然有道行，泰然自若；莊定山因此自愧不如。王船山批評這兩个人，說是：“定山之怒，正也；而輕用之惡少，則君子之威亦褻。”对这些人發怒，失了“君子”的身分；“白沙亦未免有柳下惠不恭之意”；“柳下惠不恭”，这是用的孟子的理論。孟子說“伯

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伯夷是“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”恐怕別人沾污了自己；柳下惠則不在乎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，尔为尔我为我，把人看的不算人，就跟狗一样，各不相干！所以傳說柳下惠坐怀不乱；孟子都不贊成。王船山应用这一套批評了陈、莊兩個人都不对。这个事兒倒很难处理！他于是自己發問：倒底該咋办？他又自己答說：这二位根本就弄錯了，他們既然都是身居高位，压根兒就不該跟小百姓同坐一个船！（大笑）滿可以單包一个船嘛！說到这里，他又感慨系之：孔子說過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”，所以孔子就碰不到这种倒霉事兒；可見孔子真是有先見之明，真不愧为聖人呀！（大笑）

又象傅青主，是明末遺老，很開明，和顧亭林是好朋友。但当明末他还年青的時候，在太原巡撫衙門里。李自成那時已經打到西安，一般人紛紛傳說李自成秋毫無犯，鬧的人心大動；傅青主便献了一計：弄几个人假裝从西安來，到处造謠“賊軍殺人放火”，这样一來，人心才不傾向李自成，太原城才穩住了。所以散布謠言倒不僅是蔣介石的創作，傅青主倒是个“先知先覺”！（笑）由此可見，傅青主尽管有他進步的一面，但在基本立場上畢竟还是个地主。不过話分兩头，也不能說：“反正你是地主”，就此一筆抹殺。

第四，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。一个人尽管複雜，尽管是多方面的，但我們立論却須有个重點。這一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曾經有很好的指示。文学到底是歌頌好哇，是暴露好哇？都好都不好，看对誰。对敌人的缺點当然要暴露要諷刺；而我們自己有沒有缺點？有。但應該善意批評，不能誇大缺點，專找缺點；而主要是寫光明，缺點只能

成为光明的陪襯。毛主席又具体提出來魯迅的諷刺筆法，这种筆法魯迅只有对敌人才这样用。有人在初來政治學習的時候問：难道蔣介石就沒有一點好处嗎？（笑）——这个話很难說，就假令他果真有那末一點好处吧，我想，这倒不劳你操心，自有他的狗腿子替他搜集捏造！（大笑）

孟子講，“有人于此，越人關弓而射之，則己談笑而道之：無他，疏之也；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己垂涕而道之：無他，戚之也。”——你看，咱哥兒們，多犯不着！（笑）对于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本階級的錯誤是采取治病救人、与人为善的态度，而不是攻擊，諷刺；而对付敌人当然要諷刺，攻擊，以至声討！

“人民日報”最近總是刊載“我們偉大的祖國”，头一次引起我注意的是天安門的照片。天安門当然是封建遺物，过去这些建筑講究左宗庙右社稷，不成問題，完全是古典的封建格套。而現在居然把它搬到國徽上，說这是劳动人民的偉大創作，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の結晶——对不对？完全对！就像說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或專制魔王都对一样。如果我們要講反封建，当然把这些东西举出來作为封建代表之一，因为我們反对这些帝王的享受品；但如果要講“我們偉大的祖國”，也一样把它拿出來，因为它不是皇帝自己搬磚盖的。講到“我們偉大的祖國”，我們自然也忘不了偉大的万里長城；但如果講到秦始皇如何暴虐殘忍，我們也忘不了万里長城和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。这个东西本身并無所謂封建不封建，只看在誰手里掌握。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原是皇宮，但現在它却成了全世界人民瞻仰的中心。

所以，講歷史不是死板的，应当時時与目前政治任务相

結合。蔣廷黻講近代史曾經大捧耆善，蔣介石便看中了他，一下子把他提拔上去，当什么駐苏大使，行政院里什么祕書長，一直到現在，還讓他跑到聯合國丟人現眼。又有些人大大恭維秦檜——这些人倒是和他們的“政治任务”密切結合了：他們的任務就是賣國。切不要喊：“學術自由呀！你說秦檜奸，我們不妨平心靜氣分析分析——客觀一些呀！”不行！你反動！都正在抗戰，你偏要澆涼水，都講愛國，你偏要賣國！

錢玄同治國故，据他說是要“揚糞”——我把糞揚起來，叫大家都知道臭。（笑）在當時，正是強烈地反封建束縛的時候，這種說法也還有他一定的道理。但現在如果有人說：“中國過去的文化根本是个大糞坑！”行不行呀？中國假使是个大糞坑，我們愛它干什么？

以上兩點倒可以防止右的偏向。

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，為了具體一點，這裡舉出兩個很好的典范：列寧曾在很多地方說到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，對他極端推崇與贊揚；但他不還有一篇“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”的文章嗎？這篇文章一方面對孫中山很恭維，完全是友誼的同情的態度。但他也同時沒有忘掉孫中山主觀的、空想的一方面，列寧說他：“談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”。他是什么就說他个什么，還他个本來面目。話雖然這樣講，但對於孫中山主要的還是贊揚與恭維，因為中國當時所需要的就是民主革命，孫中山完全代表了進步方面，所以對於他的估價列寧是很好地與當時的政治任務結合了的。這是一個很好的典范，大家可以把這篇文章好好看看。